张恨水抗战杂感简论

余 迅

最后关头的雄壮呐喊

一、张恨水抗战杂感纵览二战大局，缕析形势利害，指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野心及本质，规劝中立国改变观望骑墙态度，同时号召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正义力量义无反顾地投入侵略战争，从而起到了鼓舞民气振奋士气的作用。

评论时局，纵横捭阖，是张恨水抗战杂感的一大特点。在《最后关头》和《上下古今谈》的不少篇章中，作家站在国内、国际战局的高度，预测战争发展趋向，全力推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希魔的历史合订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东侵的历史角度考虑，认为“希特勒分明是编了一部拿翁与威廉的历史合订本”，暗示希特勒注定失败的下场。《纳粹领袖的伏笔》一文通过对戈培尔新年讲话的分析，认为轴心国是向来拿说大话救命的，他们的头儿一再公开的示弱，“承认德国已经不行”，“贫血的程度，大概是不浅。”恨水先生善于正面文章反面看，故而有纳粹分子始料不及的反面效果。《幸而墨索里尼无须》一文讽刺意大利侵略者先是不可一世，盛气凌人，后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的窘态。《作壁上观》以楚汉相争的史实，嘲讽土耳其、西班牙等中立国的无知和软弱，表达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最终只能是渔翁得利的观点。《笨人的聪明话》活活拆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前朝不保夕却又自吹自擂的丑态。先是引用日本首相小矶于战败前所吹的牛皮做靶子，然后顺其逻辑，进行归谬式批驳，读者从中读出了“日本必败”隐语。尤其是文章结尾不经意地带上一句：“德国的纳粹是日本的师哥。”这其实是巧妙地将所有轴心国的牛皮大王们一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中国人最靠得住》一文向世人宣示：向以孔老夫子食兵信为立国三原则的中国最崇德报功，是天上一点雨，地面一滴水，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中国交朋友结盟，是最靠得住的事。这是最好的外交宣言。他写《假如中国不抗战》，一连用了九个设问排比，说明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最大力量，中国何负于世界？杂感《殉难次之，救难为上》、《又是一·二八》、《文官不爱钱》等，皆嬉笑怒骂，犀利泼辣，直接为抗战服务。恨水抗战杂感，对德意法西斯、汉奸卖国贼嘲讽是锋芒毕露，酣畅淋漓的。《割肉喂虎》一文猛烈的抨击了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侵略本质。同时也对蒋政权的纵容退让予以严厉谴责。

二、张恨水抗战杂感大胆率真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对抗战时期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黑暗现实，以及姑息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趁机大发国难财的现象予以讽刺和谴责。同时，极力主张国共两党是兄弟关系，应精诚合作，团结御侮。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然而投机商人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囤积居奇。张恨水身处山城，时刻关注国运民生。《荀子释勇》一文讽刺了现代商人“为了利，争财货，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见。”其与盗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抓越痒》委婉抨击国民党政府片面治理造成的恶性循环，犹如一个人满身患疥疮，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必须全面治理，不姑息那些疥虫。针对“节约献金”运动中强制贫民百姓“献金”，连学生、歌女都不能免，却不见巨富豪门献金的现象，作家用童话故事狮子病了要输血，吩咐狐狸找血源，狐狸欺软怕恶，找了一些蚂蚁田鼠小动物，结果因血尽，死了无数，而不敢找虎狼，用寓言的形式讽刺献金运动的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荒谬。（见《狮子输血》）

《听谎有瘾》一文谴责一些缺德文人最会撒谎。指出分明为的是升官发财，捧捧伙伴，攻击异己，而七转八拐说是为救国。撒谎的不足怪，偏有人拿着老百姓的脂膏养活一班撒谎专家，真有那种爱听谎话的瘾。《忌言社会弱点》一文针对有人以为抗战期间社会上纵有什么丑恶也不必去暴露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似乎应当加以考量。“我们不能因为抗战，就让社会去污浊黑暗，世界上也没有以污浊黑暗社会，来做国家基础的，不予暴露，永不改善，危害的不仅是伤及国家体面了”。这段话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可以说千古未有，而此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情，竟也旷代难见。作家撰文讥讽孔公馆地洞豪华堪比宫殿、贵眷们的狗占飞机座位、达官贵人喜吃的香蕉由热带空运而来、江苏螃蟹空运4000元一只，等等，抨击了重庆显宦富豪不知亡国恨而一味追求享乐的大后方现实。杂感《路旁的刺激》是他在重庆去中大讲课，路上见到国难中新建的洋房上订了某科长某次长之类木牌，有骨哽在喉而发出的抨击。文章说：“在抗战期中，一切物质上的享受，依然是官吏占有着，这已经够了，何必这样对民众作一富有的宣传？……” 《关于贪污》一文的批评：“假使一个作科长的人，可以住洋楼、坐汽车，他的上司必定有几千万存在外国银行里……国内有没有贪官，贪官是谁？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复。查一查全国官吏和私生活是否和他的薪金相称，便可明白了。”在今天依然是一篇幽默的反腐檄文。

《学学罗斯福与威尔基》一文由美国的两党合作谈到战国时期的廉颇蔺相如交欢，认为战争时代国家民族第一，政治第二。《父母兄弟之间》以“诗经小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诫，暗示国共两党是兄弟关系，应精诚合作，团结御侮。《京城双摇会》以一个多妻制家庭女人争风吃醋，两个劝架老头从中受益，其暗示不言自明。联想到连战、宋楚瑜、郁慕明先生不久前在北京高校的演讲，在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恨水先生的睿智、胸襟与视野。

三、抗战杂感以反映人生的社会写实态度，很强的社会忧患意识，关注着人群，抨击上流社会的堕落，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站出来同民族同人民一起承受着沉重的苦难和不幸，承载着他对世事与国家民族的关怀。

他告诉广大民众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只有全体民众奋起进行殊死抗争，才有可能使中华民族挣脱灭亡的绝境。杂文《病壮士》与小说《汽车夫胡阿毛》有同等功效。胡阿毛讲述的是把满载敌人军火和四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与敌同归于尽的故事。《病壮士》一文记述疗病芜湖弋矶山医院的一幕：“隔室为一滁县中年汉子治肺病，每闻警报，辄跃起，握拳向空遥击。一日谓予曰：‘然则奈何？’出医院，医生强留之不可。……予杖策至院门目送之，见其昂首直行，不稍稍左右顾。时则天高日晶，疏林落水，披襟当风，真有秋高马肥之想。”恨水笔下的病壮士在民族危亡关头所表现的中华男儿气慨，告诉民众，保家卫国，匹夫有责。《陈散原殉难》《周县长兑现》等表达了作家对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的景仰之情。在《中国之宝》中，作家认为：“中国之宝甚多，唯民族主义则宝之至大者，小日本其如我何？”

张恨水抗战杂感是旗帜，飘扬着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是号角，鼓舞着中华儿女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斗邪斗恶的士气；是匕首，狠狠地投向法西斯以及昏庸腐败的政治当局的致命要害。

展现社会良知和道义的光辉典范

张恨水抗战杂感在全部张恨水创作中所占比例不多，但其作用不可低估，作家在杂感中显现出来的品格、道义和社会良知，堪为当今知识分子典范。通读恨水抗战杂感，综合恨水全部创作历程，有三个方面值得深刻思考。

一、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精神是永远高扬的旗帜。

张恨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百姓生活的进步作家，早在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时，作家就在他主编的报纸副刊上连续发表杂文，谴责声讨日寇的强盗暴行。他以无比的愤怒、满腔的爱国热情写了大量的文章，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和《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对日寇口诛笔伐。文章有：《当为北京而保护山东》《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学越王呢？学大王呢？》《中国不会亡国》《长江日舰三十艘》等，日本人曾因他的抗日宣传，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尔后，他这个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还成了日本人仇视的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恨水更是满腔愤怒，把正在《新闻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加进了抗战内容。他还创作了一系列抗战小说，以英勇抗战的普通百姓和兵士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纪实文学和电影剧本，还写了许多讴歌抗日爱国精神的诗词《弯弓集》。《弯弓集》（1932）是当时中国最早出版的抗日诗集，绝不是象有些评论家所说，到1938年《中华民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后，张恨水才“一时归到了抗战的大旗下”。

面对“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社会，面对大多数人打着救国的旗号大发国难财，唱高调的现象，作家痛心疾首，万分愤慨，于1933年1月30日挥笔写了《上海人已经觉醒了吗？——国难当头说国难》发表在《新闻报》上，对上流社会置救危亡于不顾，不思抗战，依然沉湎于享受之中的行为感到愤慨，予以揭露和抨击，号召国人团结起来，“人尽其智，人尽其力，共同对敌。”

张恨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作家，当他豪情万丈地与同胞弟准备在家乡组建抗日游击武装时，得不到当局的同意。请缨无路，报国有门。他不能拿枪，手里还有笔，把笔视为抗日的刀枪，报纸副刊成了他宣传抗战，召唤民众，鼓舞国人奋起抗敌的阵地。到重庆加盟《新民报》后，他每天至少写一篇杂感文字，评论时局，鼓吹抗战。坚定着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当《最后关头》的系列宣传刺痛了重庆统治集团的痛处的时候，一度被勒令停刊。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作家仍怀一腔热血，讴歌中国民众的抗日精神，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孜孜不倦地开启民智，唤醒国人。当然，以笔弯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令作家伤感困惑的是，他的一腔爱国热忱不但得不到认可，相反还要遭到攻讦，而这正来自左翼作家阵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不去争辩，不去论战，经受住极大的委屈，不屈不挠地宣传抗日。民族精神是无形的战斗力，是无敌的卫国长城。精忠报国是中国人几千年留下来的传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恨水抗战杂感中，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一颗脉动的赤子之心。张恨水用杂感文字向世人表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我们有理由说，张恨水是有正义感的进步作家，是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爱国作家，是报人的楷模，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化育的知识分子典范。现在回过头看，强加于张恨水头上的“封建余孽”，“鸳鸯蝴蝶派”帽子，是一种欲加之罪的诬陷。

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浇灌培植拯物济世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张恨水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怀拯物济世之抱负，萦爱国忧民之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这种抱负和情怀不仅熏陶自我的民族自信力，支持读者在灾难和不幸中充满信心地走过崎岖、荆棘与坎坷，而且激励着读者的社会责任感，把拯物济世的爱国情怀放大为对人生的热爱和深情。

张恨水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所面对的是一个生生不息而又苦难深重的世界。正如华人学者高建平在《张恨水生活和创作》中分析，他出身于一个旧式小官僚家庭，传统意义上的家教十分严格，这种背景使得他一方面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旧学根底相当厚实；另一方面比较忠实地恪守传统中国所要求于读书人的那一套道德与伦理体系。青年时代，随着父亲的去世，家境陡然变坏，他被迫挑起了支撑全家人生活的重担，这使得他于谋生和劳苦的困顿中深深地体味到了人生艰难，但他没在困顿中沉沦。他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忧生忧世，对天命有着某种恐惧情绪。他在《我们的帐》中大声疾呼：“当别国的轮船已经在扬子江往来如梭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在勉励他的儿孙作八股文。宇宙里尽管千变万化，他们还在百千本线装书里兜圈子。”“这样的国民，怎么对付无数张牙利爪的列强？”这样的呼喊，振聋发聩！他在《一代作官》中深刻地揭示着这样一种现象：一方是饥饿与流亡载道，而另一方，酒食馆里终朝醉饱，娱乐场所座上客满，汽车往来如飞，洋楼望衡对宇的都是公务员。事关爱国等大是大非问题作家决不肯苟且，更显出他的气质和节操。作家的精进与执着，有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百姓胸襟；有如顾炎武“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社稷情怀；有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爱国热忱；有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而仍执着追求真善美的超脱和潇洒。恨水抗战杂感忧患意识熏陶着我们的民族性格，使国人能正视人生，正视社会，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他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展现了超时空的博大胸怀。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考，并且以这种品格熏陶、影响、感染着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创造文明。

当今之世，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成长，精神文明建设没能同步跟进，传统价值观被当作糟粕抛弃，新型价值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心灵无所依归，行为失范，精神滑坡，人文衰落！人情冷漠，急功近利，贪婪、浅薄、短视、良知泯灭等种种精神瘟疫弥漫于我们的生活空间，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弘扬人文精神道德的严重障碍。为什么现行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奖惩机制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和导向？它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民族文化守夜人的职责，向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为什么大都以急功近利的思维面对现实？为什么不愿提出新问题，不能对前沿性的问题做根本性的追问，不敢从整体意义链上对问题作本体性界定，而只是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发出无关痛痒的声音？捧读恨水抗战杂感，不得不敬佩张恨水的人格魅力。

三、直面现实，敢讲真话，体恤平民，关心国运，始终代表着社会良心。

张恨水一直在新闻工作岗位上，作一个有着风骨与格调的读书人与新闻记者，在思潮动荡的时代里，他是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张恨水从来都讲真话，不随波逐流，不仰人鼻息。他不偏不倚、不党不派，只是为民而鸣。他从不宣扬任何政治意义，不服膺任何政治理念，只是说真话。就如茅盾所说：“张恨水写了一辈子真话，这和党不党没有关系。”（《张恨水小说新论》赵孝萱）在《新民报》《最后关头》被查封之时，陈铭德安慰张恨水：“新闻自由是我们报人的追求”，“你是一个敢直面现实的真正报人。”恨水在会见国民党高官张治中时表白：“我无党无派，我写文章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我的笔也只以人民利益为准绳，不站在哪党哪派一边，我坚持‘君子不党’的古训，我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批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恨水创作给我们以这样启迪：一名具有独立品格的作家，即使没有党派背景，只要在践行宪法法律的基础上服膺真理，创作以民族和人民利益为依归，只要坚守社会良知，丝毫不妨碍作家才华的发挥和激情的碰撞。

张恨水坚持思想自由与独立的风骨，既不轻易评论非议别人，也看不到他有什么论战文章。他只是不断地写，写出他想说的话。他绝不为时潮所动，坚持自我立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是一个兼具学者气与文人气的知识分子。作家在小说《傲霜花》中借唐子安之口表白的一番言辞，可以看作是作家心志的剖白。“我以为一个人，不完全是看钱说话，靠物质享受找路径的。我们住着草屋，吃着红苕稀饭，表面上的确苦不堪言。可是清夜扪心，觉得我的灵魂上没有蒙上丝毫的龌浊。说到圣贤书为何事，也许太迂腐一点。不过我们忝为知识分子，应该严守自己的岗位。”张是一个传统文人，他固守着传统文人的人格世界，特别是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道德美质作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他的关注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存在关怀”。

知识分子本来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应用者，更是文化的发展者与创造者。文明发展需要不断地批判和探索未知，这一职责天生就是由知识分子承担。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代表着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得天独厚，受了人间恩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大责任来。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责任便是对于社会的批判。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有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应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和精神，去担当领导民众继往开来的责任。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张恨水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感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能力，是一种迫切需要，作家、记者以至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应该在生活、工作、人格及社会良知上更多表现出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烽火熄灭，硝烟飘散，抗日战争结束70年了，70年来中日间的争战并未停息。中国虽然得到了战胜国的地位，实际上却没得到战胜国完全应有的待遇。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付出了极大代价，占二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直接经济损失1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千亿美元，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人从来不承认被中国打败。日本首相和高官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甲级战犯亡灵，日本政府曲意修改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日本单方面批准民间开发东海油田等等，种种动作表明不但没有谢罪诚意，而且亡我之心不死。面对日本对中国人感情的蹂躏，令人想念当年《最后关头》那样旌旗飘飘，鼓角相闻，令人想念当年张恨水那样振臂疾呼！当今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负责任大国需要负责任的媒体和像张恨水那样有良知道义的作家群、记者群，使我们民族同胞被侮辱的愤怒得以足够表达，使我们能够在缺乏道义良知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面前理直气壮地站得起来，不输精神！作家曾在《怎样制裁寇机》中这样写道：“对于这种兽性的人类，有什么理可讲？有什么人道可谈？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予以打击者以打击。”70年前是如此，7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要耽于幻想，与虎谋皮，不可以一厢情愿地指望日本配合我们，理解我们。更不可以被他们的舆论牵着鼻子走，让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戏弄！笔者认为，这才是品读张恨水抗战作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余迅，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理事，曾任中共潜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